



编者按:抗战时期,民盟作为中间政治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始终坚定维护团结抗战,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宣扬抗日之声,力主实行民主政治。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刊发三位盟员撰写的专题文章,一同回顾民盟为抗战作出的重要贡献。

理解民盟抗战贡献的三个维度

● 吴原元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同抗争的结果。在日寇侵略、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民盟作为中间政治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盟是团结抗战的坚定维护者

1938 年,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部分毕业学员作临别讲话时,提出了“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这一著名的抗战公式。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的抗日态度日趋消极,并掀起反共高潮,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是保障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黄炎培即言,“欲求抗战的胜利,须得每一个人努力于抗战条件的增进,最重要的胜利条件是什么?就是全国一致精诚团结”。面对国民党的分裂行为,张澜曾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好事,为啥子要反它?恨它?还成立啥子防共委员会,这岂不是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吗?”1939 年 10 月,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其成立初衷即“鉴于国共不协,隐忧实大”,故“结合国共以外之各党派暨在野人物,进以求全国之团结抗敌,退亦将抑止内战”。

1941 年,面对“皖南事变”引发的国共危机,黄炎培指责国民党“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沈钧儒认为“任何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卑劣行为,都是违背人民的意愿的”,呼吁“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统一建国同志会在发出谴责国民党分裂行径之声的同时,

要求“国民党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与此同时,他们以参政员名义奔走于国共之间展开斡旋。在中共的坚决斗争、民主党派的调解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蒋介石承诺“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共关系趋于缓和。有感于“眼前最切之要求为加强国内团结”,黄炎培、张澜等人以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联合“三党三派”及其他社会贤达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伊始的民盟,即将“加强国内团结”列为其十大纲领之一,并为之奔走呼吁。

面对敌强我弱的抗战现实,只有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时期民盟始终努力沟通国共歧见,化解国共矛盾,推动国共合作。民盟是团结抗战的坚定维护者,亦是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民盟是抗战宣传的重要力量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面对日本的全面侵华,国内不少人持悲观论调。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国人更是被悲观主义所笼罩。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的抗战意志力面临巨大的考验,让民众始终葆有抗战意志与必胜信念,是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条件。

1938 年 10 月,汪精卫在重庆公开发表“非和平即亡国”的言论,之后又称国民政府应以日本所提三原则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对于汪精卫的公开叛国投敌,民盟先贤予以强烈谴责。1939 年 1 月 3 日,张澜会同黄炎培等发表《讨汪

通电》,称“惟愿吾全国同胞,认清利害,坚定意志”;同年 9 月 2 日,在接受《新蜀报》记者专访时,张澜再次声讨汪精卫,“汪逆本身已经是臭得令人作呕了”;胡愈之接连发表《谨防疫病》《“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质疑》,呼吁国人与妥协投降的逆流展开坚决斗争。正是在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方的强烈呼声中,国民参政会在汪精卫叛国 10 个月后才通过了《声讨汪逆兆铭案》。

与“妥协投降论”斗争的同时,民盟先贤积极创办抗日刊物,宣传抗日与民主。1938 年 7 月 7 日在汉口创刊的《全民抗战》,系由沈钧儒主持的《全民周刊》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合并而来,其以“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为宗旨,注重贯彻“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基本主张;1944 年 12 月,民盟云南省支部创办《民主周刊》,大力宣传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思想。除此之外,民盟先贤还以笔为武器,坚定民众抗战的信心。1938 年,沈钧儒在《血路》上刊发《如何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阐述全民团结抗战的要义;1939 年,潘光旦先后发表《抗战的民族意义》《抗战与选择》,阐述坚持抗战的必要性及其可能性。

民盟先贤对于中共的积极抗战亦不断予以宣传报道。胡愈之阅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后,深感此书价值之大,遂四方奔走,组织翻译,并为出版此书专门成立“复社”。在其努力下,中译本不到四个月即问世,并取名为《西行漫记》。曾担任外交部部长的黄华就中译本的出版如是言道,“《西行漫记》的出版打破了国民党 10 年的新闻封锁,揭穿了它的造谣诬蔑,打开了人民的眼界,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反

抗侵略的斗志”。1944 年夏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访延安。在延安的一个多月,他在重庆、成都两地的《新民报》上以长篇通讯的形式全方位介绍陕甘宁边区。连载结束后,即以《延安一月》为题结集出版单行本。毛泽东读后称,“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1945 年 7 月,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回重庆后,他写下《延安归来》,并于同年 8 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此书以“延安归来答客问”和日记摘录形式记录延安见闻,成为大后方备受瞩目的畅销书。

抗战中的民盟先贤以笔为武器,为坚持抗战鼓与呼,鼓舞民众抗日信念;与此同时,积极宣传抗日主张,使其为国统区民众所了解,与中共抗日主张相呼应,由此放大抗日之声。就此而言,抗日宣传是理解民盟在抗战中的贡献所不可忽视的又一重要维度。

民盟是民主抗战的生力军

早在“七七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而如果“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社会变革是保证民族觉醒的激励机制,是持久抗战的动力所在。没有社会变革的有效进行,就无法形成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坚强意志,持久抗战只能是一句空话。抗日与民主实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因此,抗战与社会变革同步同向成为包括民盟在内的中间党派普遍期待与追求。

早在成立之始,救国会就提出实行“民主制度”和“救国政策”。1941 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其政治主张为

“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光明报》在社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中明确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旨在通过言论与理论“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因为“只有民主势力培养起来,才能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正是基于对民主与抗战关系的认识,民盟始终以推动民主为己任,投身对民主的追求之中。1939 年 9 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民盟先贤即与中国共产党一道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1941 年 11 月,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民盟参政员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等人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再次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1943 年 9 月,面对蒋介石所作的“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的许诺,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1944 年 5 月,民盟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中央锐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国家“是一个十足的反民主的国家”,强烈要求国民党“放弃十余年来的特殊地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共所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民盟予以积极的回应。1944 年 9 月 15 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召集各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对于中共的这一倡议,章伯钧慷慨陈词:“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1944 年 10 月 10 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结束国民党

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府。对于中共与民盟的呼吁,蒋介石声音,“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的决定权,移交给各各党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理论与事实两不容许的局面”。对此,民盟发言人提出“国民大会开会之日,应即为国民党党权暂告结束之时”。民盟在《对时局宣言》中,更是要求从速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政治性会议,“务使最短期内,达成改组举国一致政府之目的,以履民望!以利国家!”

张澜曾言:“我们的中心主张,如前所说,一向就是民主、团结、抗战三层。而其中尤以民主一层为中心的。因为我们相信,中国如不实行民主,任何政治问题、党派问题、经济问题、物价问题、抗战问题、军事问题以及一切社会教育文化问题,必都不能圆满解决。”如其所言,抗战时期的民盟或创办刊物宣传民主,或以国民参政会为阵地,在国统区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民主运动高潮,因此被中国共产党称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由此而言,民主既是民盟的追求,亦是理解民盟抗战贡献的重要维度。

80 年后的今天,抗日的硝烟早已散去,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侵略者的铁蹄踏碎家园,民盟以“宁为玉碎”的决绝共赴国难。我们应接续民盟先贤在血与火中所淬炼出的信念之光与担当精神,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民盟市委学习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歌为战鼓：刘良模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 刘友梅

202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当硝烟散尽,历史深处依然回荡着激昂的旋律——那是抗战年代响彻神州大地的救亡歌声,是唤醒千万民众奔赴战场的惊雷,更是连接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无形纽带。在这场民族救亡的雄浑交响中,被誉为“天下无人不识刘”的刘良模,以其非凡的智慧、坚定的信念与炽热的爱国情怀,将音乐锻造成抗击侵略、凝聚民心的锋利武器,谱写了一曲“以歌为戈,心系祖国”的壮丽史诗。

沪江启蒙:从青年学子到救国先驱

刘良模 1909 年生于上海,1928 年考入沪江大学社会学系。该校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提倡“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争生存”的信念,深刻影响了刘良模。“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投身抗日洪流,组建“自强团”,疾呼“为国家吃苦甚至死亦在所不计”,并在青年会教唱歌曲。1932 年,他进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以社会活动践行救国理想。

1935 年“一二·九”运动掀起救亡歌咏浪潮。1934 年冬,刘良模在上海创办“民众歌咏会”,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为唱歌而唱歌,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开始有 90 人,数月后 300 余人,礼堂座无虚席。他宣言:“我们不为唱歌而唱歌,为民族解放而唱歌。”他推行“小先生制”:学员学成后回校、厂、店再传,呈几何级扩散;《青年歌歌集》《义勇军进行曲》等 49 首战歌,7 次再版,销售逾万册;《民众歌咏 ABC》成运动手册;他填词的第一首歌《救中国》,以“救、救、救中国,一齐向前走”的铿锵节奏,唤醒民众民族意识。

歌声抗敌:从上海街头到全国战场

1936 年,刘良模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领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当选执委。同年 6 月 7 日,他在西门公共体育场组织千余人歌咏大会,吸引 5000 多名群众。面对军警包围,他登上高凳领唱,高呼“大家都爱国,都要抗日!”“最终军警与民众唱成一片,《立报》称现场“像一座座将爆发的火山口”,群众高唱战歌上街。这场活动使刘良模和歌咏会声名大振,此后他被沈钧儒先生称为“救国会的拉拉队长”,但也招致打压,歌咏会最终被迫停止。然而火种已燃遍全国,广州、南京等地纷纷成立歌咏组织。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刘良模担任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京沪支部主任,将歌咏火种播撒前线。他在苏州创设“伤兵俱乐部”,在郑州创作《打日本歌》,在长沙组建“难童歌咏队”,在金华训练“歌咏轻骑兵”,深入学校、工厂、田间甚至组织小贩、盲艺人唱歌。1939 年,周恩来视察新四军时专程看望他们,高度赞扬其以歌咏启发群众爱国热情,并将军人服务部作为通往新四军的联络站。刘良模以“歌咏+服务”模式,成为温暖兵心、激励士气、巩固统一战线的坚强堡垒。1939 年夏,因与新四军交往密切,刘良模被国民党逮捕,经斡旋获释后,于 1940 年被迫赴美。

声震寰宇:抗战歌曲传遍世界

在美国期间,刘良模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通过电台播送《义勇军进行曲》。经林语堂介绍,他结识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罗伯逊深受歌曲震撼,称“起来!不愿做奴



▲刘良模指挥 5000 人同唱抗日救亡歌曲

隶的人们”唱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心声。1940 年夏,罗伯逊在音乐会上首次公开演唱此曲。1941 至 1942 年,两人合作录制英文版(Chee Lai! Arise!),并于 1942 年灌制唱片《起来!新中国之歌》,收入全部捐献中国抗战。罗伯逊此后每场音乐会都将中英文《义勇军进行曲》作压轴,观众高呼“March On”。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反法西斯共同语言:太平洋战场,美军陆战队把《义勇军进行曲》编入军歌集;法国抵抗组织将《马赛曲》歌词填入此曲的旋律,在抵抗运动中传唱;开罗会议期间,犹太抵抗组织在华沙废墟唱起波兰语版《起来》。

1945 年联合国制宪大会上,各国代表合唱此曲,庆祝胜利。二战胜利日,美国电台向全球播放中国凯旋之歌——《义勇军进行曲》。

破晓新声:力荐《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 年 8 月,刘良模应周恩来邀请回国出席新政协。9 月 25 日,距开国大典不足一周,国歌选定遇阻时,他在协商座谈会上发言指出,《义勇军进行曲》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得到人民广泛认同,足以媲美《马赛曲》,建议作为新中国国歌。毛泽东、周恩来采纳其建议,强调歌曲的历史警示意义。9 月 27 日,全国政协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 月 1 日,刘良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该曲首次作为代国歌奏响。

新中国成立后,刘良模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侨联副主席等职。虽然工作重心转移,但他推广“爱国歌曲的热情未减,仍时常受邀指挥《义勇军进行曲》等爱国主义歌曲的大合唱。1988 年,刘良模在上海逝世。

刘良模以歌咏为武器,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他推动救亡歌咏运动,用歌声唤醒民众爱国热情,鼓舞军民抗战士气。刘良模的爱国主义精神超越时代,凝聚于民族复兴的共同目标。当旋律再次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抗战的呐喊,更是一个民族永不停歇的“前进”之声。

(作者系民盟市委研究室二级调研员)

后人忆先贤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沈钧儒

● 沈铨

今年恰逢我曾伯祖父沈钧儒先生诞辰 150 周年。回望历史,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已是 56 岁的年纪。这场战火深深触动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壮丽场景,让他深受感染。他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抵抗外来侵略的洪流之中。

他积极鼓励并支持上海法学院的学生投身抗日救国工作,例如支持“上海法学院社会科学社”派代表参加由上海 19 所大专院校学生发起组织的“上海大学生联合会”。同年 9 月 25 日,他在给儿子的信中痛陈国难,认为日本侵略使国家尊严扫地,痛苦堪比亡国,同时他也对学生运动提出了中肯建议,认为停课哀悼应有期限,最终目的在于研究挽救办法。同年 10 月 27 日,他与长子沈谦一同署名,与其他 200 余名教授联合致电国民党“宁粤和平会议”委员,明确要求准备对日作战,组织国防政府,并尊重人民权利。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迅速组织上海法学院师生及其他院校学生组成学生义勇军,投身救护伤员、慰劳将士工作。他多次亲赴前线慰问将士,参与上海律师公会募捐。他还搜集日军暴行证据,编印成册揭露日军罪行。

同年 1 月 31 日,他联合上海 81 个救国团体,共同组建“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号召全国人民为“民族生存、国家独立”而奋斗,点燃上海各界救国热情。联合会开展抗战募捐、宣传等活动,开设难民收容所,创办刊物。他积极发表宣言和通电宣传抗日主张,如与章士钊等联名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制定对日持久战略,联合会也多次发表宣言,激发民众抗日斗志。

3 月,国民政府准备与日议和,他代表救国联合会会晤谈判代表,坚决主张日军不撤不谈,但 5 月《淞沪停战协定》仍签订,他立即发表宣言反对并提出原则。

他还多次领导“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活动,将救亡行动转为群众运动,极大激发民众抗日热情,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推动民主政治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行动展现了他坚定的爱国立场和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1935 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企图分裂华北。民族危亡之际,他与邹韬奋等七位进步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此基础上,1936 年 5 月 31 日,来自全国 20 余省市 60 多个救亡团体齐聚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他主张超越党派阶层,广泛团结知识分子、工商界、学生及工人阶级。他奔走演讲,揭露日军侵略野心与国民政府妥协政策,宣传爱国思想,强调团结御侮。

救国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中共在 1935 年“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高度契合。他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主动与中共代表多次接触,深入交换意见,并公开表示坚决支持中共的主张。他的言行不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激发了强烈的共鸣,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也促使国民党内部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认识到团结抗日不仅是民心所向,更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这种跨党派的共识,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救国会的活动触动了当时国民党当局的神经。他们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为对其统治的威胁,开始对救国会成员进行打压。1936 年 11 月 22 日晚,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突然在上海逮捕了他和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身陷囹圄,却在狱中展现了非凡的气节与智慧。作为年长且